

# 沉没的历史

从“黑石号”“印坦”“井里汶”沉船谈9-10世纪我国陶瓷的外销

□ 项坤鹏

9-10世纪，中国对外贸易迎来第一个高峰时期，陶瓷大规模外销是这一时期对外贸易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。东南亚作为中国陶瓷外销的关键节点，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水文环境，导致该海域存在大量不同朝代的沉船。其中，爪哇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(Belitung Shipwreck)、印坦沉船(Intan Shipwreck)和井里汶沉船(Cirebon Shipwreck)备受关注，这三艘沉船打捞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及其他物品。对这些沉船出水文物的研究，有助于深入了解当时中国陶瓷外销的具体情况。



黑石号出水八棱金杯



黑石号出水江心镜



长沙窑“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”铭文彩绘纹碗



印坦沉船出水南汉国“桂阳监”铅铤

黑石号沉船发现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(Belitung Island)附近，因打捞时旁边有黑石礁而得名，部分专家也称之为勿里洞沉船。该船年代约为9世纪早中期，经造船专家判断，它可能是一艘来自阿拉伯波斯地区尸罗夫港(Siraf)的船只。因客观原因，无法对黑石号沉船遗物进行整体的数据统计。出土文物中，以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藏最多，共计53227件，其中长沙窑瓷器50589件，广州地方窑瓷器1591件，巩县窑瓷器256件，越窑瓷器

218件，白釉绿彩瓷器185件，邢窑瓷器119件，陶器17件，金银器及鎏金银器66件，铅、铜器55件等。

亚洲文明博物馆入藏的黑石号出水器物中，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，加上湖南、上海、香港等地博物馆零星收购的，有学者统计黑石号沉船中长沙窑瓷器总数为57500多件，在黑石号沉船中占绝对多数。此外，沉船周围散落着大量铅铤，出水6吨，这些铅铤可能既作为货物，又起到船的压舱作用。

## (一)长沙窑铭文指示沉没年代

**器型方面：**长沙窑瓷器中碗的数量最多，约占90%，此外还有盏、罐、瓶、熏炉、渣斗、盏、托、杯、碟盒、灯、水盂、动物瓷塑、鱼形研磨器等多种器型。

**年代信息：**一件碗上刻有“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”铭文，宝历二年为826年，是唐敬宗的年号。据此可判断黑石号的沉没年代稍晚于826年，但不会太晚，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定黑石号沉没于9世纪早中期的主要依据。

**文化内涵：**长沙窑瓷器纹饰和诗文丰富。纹饰有飞鸟纹、摩羯鱼

## (二)其他窑口瓷器重要特点

**越窑：**数量为一两百件，器型精美，有碗、杯、香薰、渣斗等。部分器型可在唐代墓葬中找到对应，如在唐太和四年(830年)郑州张宗武墓和唐长庆四年(844年)三门峡张弘庆墓葬中能找到相似器型，进一步佐证了黑石号沉船的年代在9世纪上半叶。

**白瓷：**数量不多，可能来自河北邢窑或巩义窑。

**唐青花：**数量不多，为巩义窑产品。

**白釉绿彩器：**白釉绿彩器代表了当时的一种风尚，部分器物与金银器造型有关。黑石号沉船中发现的部分瓷器，如带有“盈”“进奉”字样的白釉绿彩器，表明其与宫廷可能存在联系。这些瓷器进入宫廷及流落民间的渠道存在两种可能：一是被进奉到宫廷后，因赏赐、贸易等原因流落到坊间，最终汇聚到广州；二是作为贡赋的剩余品被售卖，而后集散到

广州并登上黑石号。此外，部分瓷器带有龙纹，在唐代，龙常与天子画等号，这显示这些瓷器等级较高。而且，一些瓷器的纹样与前面提到的唐青花纹样相似，均为菱形花叶纹，推测可能存在波斯或阿拉伯定制的情况，反映出异域元素的传入。另外，一些精美的瓷器如高70多厘米带有龙首和小兽造型的执壶，带吸管且内部有小雕塑的杯子等，从器型和装饰来看，有可能是巩义窑的产品。

**广东窑：**有1000多件，以罐子为主，包括不同大小、带系带流等多种样式。部分罐子上有刻字，如一件罐子上的刻字尚未被解读，而荷兰“公主庭院”博物馆一件相似罐子上的刻字被识别为波斯摩尼字母，意为“油”，推测这些罐子可能用于盛油，可能存在波斯人定制的情况。

印坦沉船是一艘东南亚制造的船舶，沉没于雅加达以北距离加岛约150公里处，沉没年代经多方面考证确定在10世纪早中期。其船货包括金银铜、锡、铅、陶器、中国陶瓷器等。出水瓷器中，广东的罐子4855件，占比66.4%，剩下的器物以越窑青瓷为主，占比在20%-30%。还包括少量青白瓷和白瓷，大部分为安徽地区

的产品。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，当时陶瓷对外贸易的产品种类比重发生了变化，长沙窑瓷器逐渐在对外贸易中消失，广东窑和越窑的产品比重增加。同时，根据银铤的制作地研究以及乾亨重宝的铸造时间(917年)等线索，可推断沉船年代晚于917年。越窑瓷器的装饰风格等特征也表明其年代应到10世纪。

将印坦沉船、井里汶沉船的船货与黑石号相比，前两者面貌相对复杂。这两艘沉船的船货有许多共同之处，如都有金锭，来自马来半岛的锡，来自东南亚和中国的玻璃、东亚的陶器、银铤、铅币、陶瓷器等。印坦沉船、井里汶沉船都是东南亚船，沉没在爪哇岛北岸相距不远的地方，航线都驶向爪哇岛，船货组合类似。这表明尽管它们年代相差几十年，但可以在同一个贸易模式下进行考察。与黑石号相比，这两艘沉船的船货主要来自西亚、东南亚、中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具有混合性，且陶瓷器产品的品类有显著变化，越窑逐渐成为最重要的瓷器品类。

结合相关文献记载，

井里汶沉船同样是东南亚制造的船舶，沉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。船货种类丰富，包括金银铜、铁、锡、铅、陶、玻璃等。中国瓷器出水49万件，占比75%，除少量白瓷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(30万件以上)。从瓷器上的刻划文字“戊辰徐记烧”(968年)以及与其它出土文物的对应关系(如与吴越国康陵、钱元瓘墓、北京韩侯墓出土文物的相似性)，可确定其沉没年代在10世纪中后期。

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有相关记载。此外，在印坦和井里汶沉船上的锡块上有“X”标志，马来半岛的吉打从七八世纪以后就一直有稳定的锡矿开采成果，且在当地发现了很多制作半金字塔状锡块的石质模具，这些锡块与沉船上的锡块有对应关系。同时，在井里汶沉船中也有来自马来半岛的货物。在吉打当地博物馆里，有类似9-10世纪左右的展品，包括半金字塔形状的锡块、具有阿拉伯风格的陶瓷器等，这些都证明当时的吉打是各国商船的聚居之地。因此，结合考古线索和文献证据，可以推断吉打很有可能就是吉打，它在10世纪承担了中国瓷器中转的任务。

[作者是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，故宫博物院考古部副主任，古陶瓷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(故宫)副主任，中国人民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北京联合大学研究生导师及学位评委委员。日前，作者在南汉二陵博物馆作“考古广州·海丝专题”2025年第1讲，本文为其讲座综述，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强整理。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]

史海钩沉

读北宋史书《隆平集》卷五《宋庠传》。

短短400余字的传记，惜墨如金，多是罗列传主的官历仕履，几乎没有具体事迹的记载。不过，却集中讲述了宋庠经历的两件事。由于这两件事的性质类似，所以撰者放在了一起，连缀加以记述。其事如下：

初，制举人与武举杂试，庠建言，六科待天下异士，宜设次具酒食礼之，武举人别试。上从其请。

庆历中，仁宗召两府资政殿，亲策以时事。庠独以为两汉对策，本延岩穴草莱之人，臣等备位大臣，自视遇如贱士，非所以尊朝廷，乃请归中书会议上奏。从之。

这两件事，《宋史·宋庠传》和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都有记载。古代的朝廷史官和私家撰史者多不乏史识，面对大量纷杂的事实，他们很善于披沙拣金，别具只眼，提炼出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史料入史。那么，这两件事有什么典型意义呢？

## 壹

我们先看第一件事的来龙去脉。

景祐元年(1034)六月，担任知制诰的宋庠和几名官员受命主持了制科考试。如果把进士考试比作大学考试的话，那么制科考试则犹如研究生考试。《宋会要辑稿·选举》记载：“(景祐元年)六月十六日，以翰林侍读学士李仲容、知制诰宋庠、天章阁待制孙祖德、直集贤院王举正就秘阁考试制科。仲容等上吴育、苏辙、张方平论各六首。”当时，宋庠尚未更名，名叫宋郊。

此次主考，看到的景象对宋庠刺激很深。以致事情已经过去一个月后，他还萦怀于心，终于向宋仁宗提出了上述建议。《长编》卷一一四景祐元年闰六月载：“甲申，诏：‘御试制科举人，自今张幕次于殿庑，仍令大官给食。武举人以别日试之。’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，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，面使条对。竦意实欲困执中也。执中方力辞未许，参知政事宋庠进曰：‘两汉对策，本延岩穴草莱之士，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，非所以尊朝廷。请至中书会议上对。’”许之，谕者以庠为知体。

从这条记载看，这件事发生，尽管表现为宋仁宗的求治心切，但背后则是有夏竦在捣鬼，想让“不学少文”的宰相陈执中当场出丑。可见一件事情结果的形成，多有复杂因素，为诸种合力作用所致。观察事相，不可为表象所惑。

夏竦这样做，出于私心，然有失大体。所以，为执政集团中地位尚低的宋庠所反对。宋庠的反对，就像是直截了当地说，我们是大臣，别拿我们当小学生。

为应试举人设桌椅，供饭菜，进茶上酒，悉心招待。因为制科是“不次之科”，参加者也是“非常之士”。在这样对比之后，宋庠严肃地指出，如果朝廷还这样慢待士人，就不会招来出类拔萃之辈。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：“臣恐有司自今以往待士之礼，因循废弃，则国家设此举，必无异人。”宋庠接着指出了原因：

士有高才，必有高节。节高礼薄，将耻而不就。

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尊严。你不重视我，我也耻于前来应试。即使有人来应试，也是些“轻躁微幸，先身而忘后义之徒”。

这件事是作为读书人的宋庠，为自己的同类鸣不平，呼吁皇帝和朝廷重视读书人的尊严，礼遇读书人。

## 貳

第二件事，则是宋庠在维护自己以及整个由士大夫精英组成的执政集团的尊严。

急于求治的宋仁宗，常常突然召集大臣，发给纸笔，让他们当场提出施政方案。当年开天章阁让范仲淹、韩琦提出改革方案就是一例。这次又在资政殿重演故伎。《长编》卷一六三庆历八年三月甲寅策对此事有详尽记载：

又诏翰林学士、三司使、知开封府、御史中丞曰：“欲闻朕朝阙失，左右朋邪，中外险诈，州郡暴虐，法令非便民者，及朝廷凡事，其悉以陈。”皆给笔札，令即席上对。而宰相执中固解，上复敦谕，至于三四，乃听两府归而上之。

时枢密使夏竦知执中不学少文，故为帝谋以策访大臣，面使条对。竦意实欲困执中也。执中方力辞未许，参知政事宋庠进曰：“两汉对策，本延岩穴草莱之士，今备位政府而自比诸生，非所以尊朝廷。请至中书会议上对。”许之，谕者以庠为知体。

从这条记载看，这件事发生，尽管表现为宋仁宗的求治心切，但背后则是有夏竦在捣鬼，想让“不学少文”的宰相陈执中当场出丑。可见一件事情结果的形成，多有复杂因素，为诸种合力作用所致。观察事相，不可为表象所惑。

夏竦这样做，出于私心，然有失大体。所以，为执政集团中地位尚低的宋庠所反对。宋庠的反对，就像是直截了当地说，我们是大臣，别拿我们当小学生。

## 叁

宋庠何以对这两件事这样敏感，反应如此强烈呢？这里面似乎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。

宋朝自太宗朝开始大规模开科取士，真宗朝继续实行这一政策，几十年下来，“满朝朱紫贵，尽是读书人”，从中央到地方，科举入仕的读书人占据政治领域的大小高地，前所未有的士大夫政治终于形成。这种士大夫政治既激发了读书人的责任感，也唤醒了读书人的自觉意识。士不可辱，士不可轻，高才与高节相应。极大的政治参与，让士大夫拥有了主人翁的尊严。

幸而在宋庠的《元宪集》卷三一收录了他上奏的这篇《上贤良等科廷试设次札子》。这篇上奏札子不短。过去的官僚奏疏，尽管都是围绕一个主题，但为了能让君主愉快地接受，往往委婉曲折，溯古道今，引经据典，并且还夹杂许多客套话，力争滴水不漏，八面玲珑，因此即使是件简单的事，形成了奏疏，也篇幅不菲。除了有欣赏文采的嗜好，我估计过去的皇帝也会跳过许多虚文，择要而阅，没有耐心逐字通篇御览。所以，我们也择要来观察一下这篇奏札。

宋庠先是回顾了制科考试当日让他备受刺激的景象：

伏睹贤良方正苏轼等就

试之日，并与武举人杂坐庑下，消揣辞写卷，皆俯伏地上，自晨至晡，讫无饮食。饥

劳脾瘁，形于叹嗟。虽仅能成文，可谓薄其礼矣。

接着宋庠如此描述了武举人：

武举人等才术肤浅，流

品混淆，挽弩试射，与兵卒无异。

这种描述，清晰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重文轻武的观念。这是进入宋代后，由朝廷的导向所形成的时代风气。让这些“以兵卒无异”的武举人与高级文人混杂同处进行考试的做法，宋庠上升到有亏国体的高度加以批评：

使天子制策之士并日较能，此又国体之深讥者也。臣窃为朝廷惜之。

对此，宋庠没有引古道今，而是搬出了刚刚过去的祖宗法：

臣不敢上引汉唐以烦省

览，仰惟先帝故事，布在耳目，缙绅列位孰不知之？

谨按真宗皇帝凡五策贤良，皆躬御便坐。其举人就试，并于殿廊，张幕为次，垂帘设几，大官赐，酒醪茶茗，无不毕供。

圣人之心以为张不次之科，待非常之士，所咨者天人之际，所质者古今之宜。言若可行，高者足以和阴阳、跻仁寿，下者足以明利害、观学术。是则所责于人者若是之重矣，所设之礼又可以轻乎？

宋庠说，先朝曾五次开制科，真宗皇帝不仅亲临，还

有过轻视。因此说，作为士大夫精英的宋庠的反应，并不过度，实在是极为正常的反应。

(作者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，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；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、北京大学客座教授、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等)